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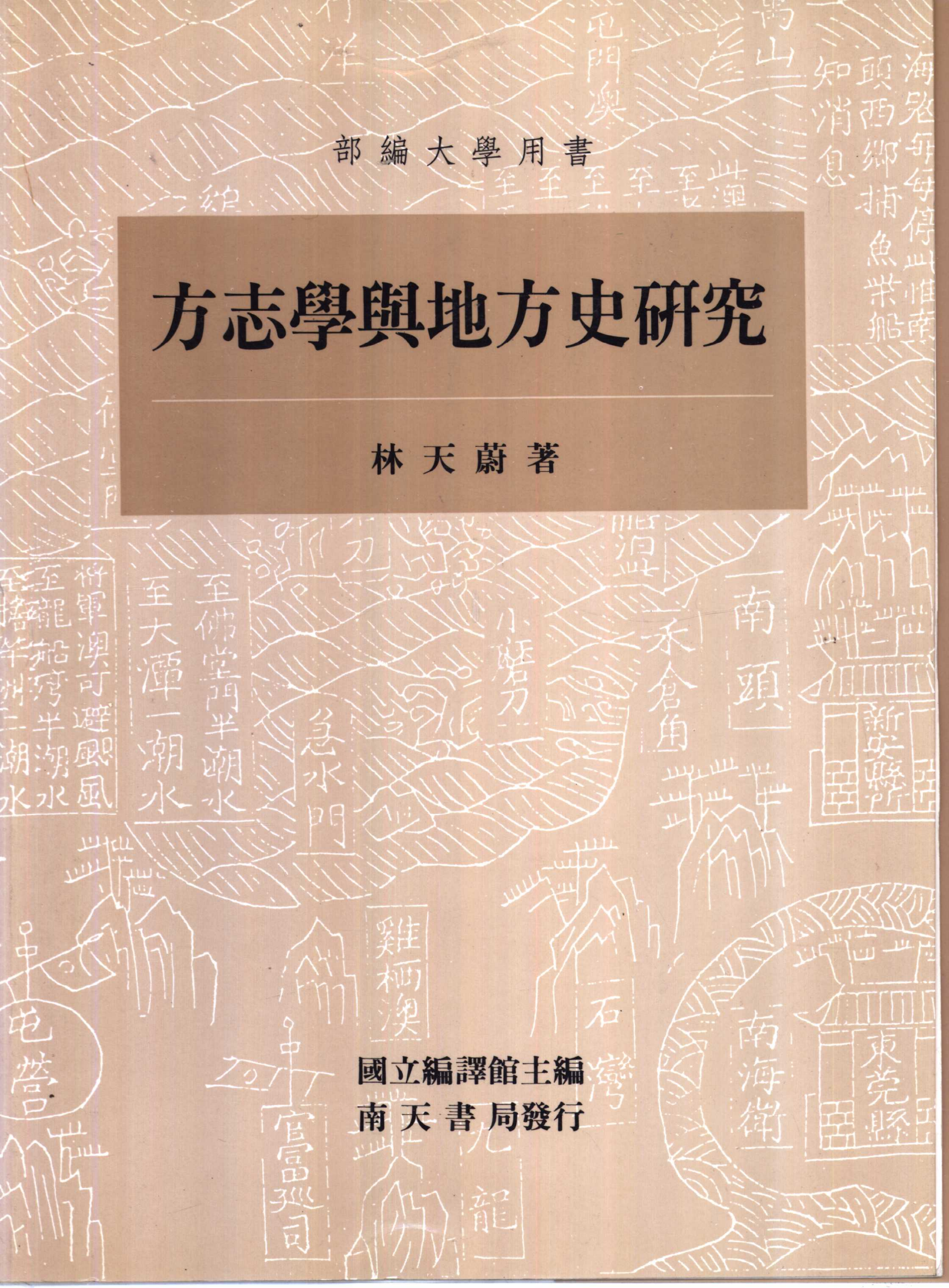
部編大學用書

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

林天蔚 著

國立編譯館主編

南天書局發行



部編大學用書

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

林 天 蔚 著



國立編譯館主編
南天書局出版

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林天蔚著．-- 初版．--

臺北市：南天，民84

面； 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638-288-2（平裝）

1. 方志學

670

84006218

部 編 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
大學用書

定價新台幣450元

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初版一刷發行

著 者：林 天 蔚
著作權人：國 立 編 譯 館
主 編 者：國 立 編 譯 館
發 行 者：魏 德 文
發 行 所：南 天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中華民國·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4弄14號
☎ (886-2)362-0190 電傳Fax：(886-2)362-3834
郵政劃撥：01080538號（南天書局帳戶）
登 記 證：局 版 台 業 字 第 1 4 3 6 號

著作權所有
翻印必究

.....
製版廠：豪華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 (02)309-1235 台北市西園路2段279之7號4樓
印刷廠：皇甫彩藝印刷有限公司
☎ (02)303-5871 台北市長泰街297巷14號

ISBN 957-638-288-2

謹以此書紀念

父挺生公
先師香林教授

序

學界同道知友林天蔚先生，生平研治唐宋史著聲士林。且長期主講香港大學及政治大學。惟林先生亦深研香港史、方志學及族譜學，皆具卓識，著作等身。

余與天蔚訂交二十餘載，經常拜讀其方志、族譜及香港史等論著，用增廣識見，備獲良益。抑且余在香港中文大學亦教方志學一課，與港大相對，學養不能匹稱，多承天蔚垂愛，鼓勵示教有加，幸得勉強附驥。回台之後，天蔚在政大講授方志學，余又在師大講授方志學。鬻宮連衡，與天蔚更時相親接。所學相近，固乃針芥契合。天蔚愛人以德，交游多碩學宏儒。余在港承其多方護持，回台又相與啣濡，可謂氣味相投，患難相共，道義可相託也。

近二十年來，大陸上輿地方志學相當興盛，決不下於民國二十年代《禹貢半月刊》創刊時代之輿地學研究。有三個範圍重大開拓，各自具有獨立領域規模。其一，歷史地理學，是禹貢學社一個沿承與開拓。大陸學者專家甚多，著作遠超過禹貢半月刊。其二，方志學，也是承禹貢半月刊風氣一個次要脈流而獨闢一系。近二十年大陸方志學尤著作鼎盛，遠邁前代。其三，地理遺址實察。此乃上承斯文海定(Sven Anders Hedin, 1865—1952)與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 1862—1943)之路徑，而由中國人繼續開拓之新學問。為成績輝煌受人尊重之一大門類。大抵有絲道之重建，長城遺址之復原，綠洲之考察，運河之探索。乃至長安、洛陽、平城、邯鄲、臨淄等古都之考古重建。俱有重大成績，大抵為大陸學人努力之重大貢獻。相形之下，海外台灣老輩若張其昀、王益崖、沙學浚、鄭資約、王華隆已凋落殆盡，新秀尚未起來。余在執教崗位，深覺有愧職守。同代同輩有成績者，則有嚴耕望、盛清沂、宋晞、程光裕以及天蔚為此中前驅。余只可謂附驥，差可維持研究局面。

今日學界於歷史地理、方志學，視為冷門學科，甚至連史學亦不重視，以為並無實用。只有少數學校講授歷史地理及方志學，今日學界不重學術，浮誇是尚，追逐新奇，務期驚世駭俗，一日突破前人，天下披靡，則可博取高名，領導學界，表率群倫。惟此類大聖大哲，須待海清河晏，十日並出。如今尚未降世。徒有群醜跳樑，瓦釜雷鳴，有何學問可言？令人齒冷。天蔚當此濁世，不甘同流，退而著書，欲以其生平所長，匯諸

篇章，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因乃有新著《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一書問世。海嶠一隅，海外五洲，尚有方志學著作與大陸二三十種方志學著作爭一日之短長者，則只有天蔚一人。當今海外輿地史巨擘嚴耕望、章生道、宋晞、程光裕之外，不能不肯定天蔚一人之卓卓貢獻。且與諸先進並駕齊驅，有何愧色可言？若有人認為此話不公，即請其提出史地學著作來，俾使學界共觀，可以一見高下。

林著方志學分三個重點進行探討。第一部分可謂是中國地學史及方志學發展史之研究。所見仍以方志學為全部重心，史地學上之發展，則配合方志有關者而順便論及。天蔚定為全書第一篇。內容豐富，涉論廣闊，網羅周至，充分具全程地學學術史規模。自上古通論至清代，層次分明，重點突出，使人易於洞觀全局。抑且各代資材，取用精當，具代表性，正見出作者功力深厚。

惟按中國地學史為一重大學術門類，歷代累積著作廣博而精深，多量且多樣。天蔚雖胸羅古今，目營四海，廣收並蓄，鉤深抉微。終亦不免使我搗瑕抵隙，攻伐其中一些破綻。但非辨論事實之是非，實表達所見之不同。

天蔚探討方志淵源，提出史地兩元論，並以《周禮》表史源，以《禹貢》表地源。自是一種高明指引。惟余之講授此課，並不分別史源地源。而認方志淵源有三：一即《禹貢》，表九州方物，屬貢賦之知識。二即《職方》，亦同天蔚書中之《周禮》，表土地之領屬。三即《世本》居篇，表族群之聚落，亦即都邑之史志。天蔚非不知《世本》，或以其書已亡，因不具論。但願以此質之天蔚。

本書第二個重點，是第二篇，介紹方志學理論與方志學家。自章學誠論起，直迄現代。章學誠自是創制大家，一代宗師，天蔚立專章論之，精覈深入，辨析畢盡，實所欽服。抑且並時大家，如顧炎武、顧祖禹、戴震、洪亮吉。以至近時之李泰棻、黎錦熙、唐祖培、張其昀等，亦俱詳加舉論。此中實包括方志學，及歷史地理名家，並不限於方志學，然其考論主軸，仍全部置於方志理論，自是切合本書宗旨。天蔚在此方面貢獻甚大，蓋前人除介紹章學誠外，很少再提及其他；尤少論當代，而當代本有衆多名家以及新論層出，世人甚難獲致清楚概念，天蔚此書當可彌補此一缺憾。

在我講授方志學時，亦重方志學家。但只提當世名學者，且與天蔚不同。然實不及此書之詳密宏肆。天蔚此作，理既醇正，且具特長，實所敬佩。天蔚網羅章氏以來方志理論，無不備集，幾無從補充。惟勉強一提，相信必須敘入最重要前輩朱士嘉，蓋當代學者之中，朱氏畢生專業作方志學研究，自三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志節不渝，無人能望其項背，足為方志家典範。我輩後學應知所尊敬予以表暴。此外，傅振倫自弱冠撰著方志，亦終身鑽研，至於耄耋。朱、傅二氏俱當特予標出，表率後學。

本書第三重點，乃專就廣東方志作研析論述。天蔚粵人，就地域之便，殊多所見聞，專精亦復深入。即以《廣東通志》而言，我只閱讀阮元所編之一種，而天蔚則於戴璟、黃佐、郭棐、金光祖、郝玉麟，以至於阮元無不廣加論述，實稱淵博。其他府州縣志，人物風俗，甚至香港地志，無不有所搜討。無論站在廣東地方史志以及香港史乘，天蔚自是專門名家，余少有探索，不敢置辭。甚望治方志同道有所資取。

近二十年來大陸方志學家輩出，專書甚多，不下二十餘種，期刊論文尤夥。港台兩地亦有論文可觀，而專書寥寥無幾。天蔚此書，正可彌此缺憾，當為學界所慶賀。余忝列知己，學且同好，冒昧申敘，聊抒數言。不足以當天蔚浩漢之學養，更不能盡本書之聲價。而敢於永負此言責者，則深信此書之完備，宗旨之醇正，取材之豐博，論斷之切當，與層次之分明。謹貢拙識，以博高明之雅賞；妄陳譚言，猶祈天蔚之原宥。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元月二十一日

（甲戌歲除夕前十日）

淮陽 王爾敏

草於台北之揮泥揮雨軒

林天蔚教授新著《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書後

民國以來，中外學者研究中國歷史，不僅視野開闊，而且利用史料的範圍也日漸加廣。新史料的不斷發現，對舊史記載之證誤與補缺，貢獻最大。今日史家研究國史之成就，遠邁前人，除了善於利用新方法外，亦當要歸功於大家都能知道廣泛搜輯各種新材料了。

我國是廣土衆民的國家，人民族姓衆多，全國行政區劃亦繁，一個家族或宗族，代代相繼，子孫繁衍，人才蔚起，撰有家譜或族譜，傳於後世，使奕葉子孫珍之寶之。國家因朝代遷革，舉凡戰亂時期的破壞，和平年代的建設，任何一個方域，歷數十或數百年，人文方面的變動很大，鄉之仕紳以愛鄉之心，請於現任的地方首長，設局修志；或地方長吏欲留善政美俗於後世，謀於鄉之賢者，合力纂修志書；以宏揚聲教，垂範將來。家族譜修於私家，頌揚先德，有其難以盡信之處。惟地方志，據諸官府案牘及本鄉前賢之撰著，轉較信實。明代名臣王珣於弘治十二年(1499)巡撫寧夏時，乃禮聘郡人戶部郎中胡汝礪修志，並召諸生面諭說：「地郡之有志，猶家之有譜系也，猶公曹之有案牘也。考興亡，辨是非，求隱蹟，即小可以占大，據政可以知德，由紀載之粗近可以知窺性道之本根，是宜以易易視之哉！」苟能以誠敬之心修之，庶幾真切信實，以供史氏之採擇。

清代史學大家章學誠曾指出：行狀碑傳爲一人之史，家乘族譜爲一家之史，州縣志爲一國之史，斷代史爲天下之史。只要州縣志纂修的內容詳實，爲史館所徵，藉以修天下史，便沒有遺憾了。他感嘆當時所修地方志多出文吏之手，不是清言叢說，就是隨俗應酬，國史館修史，不得已而下取於家譜狀誌或文集中之記述。然而私家傳記恐有失實，如無方志以爲之佐證，則難以考信，所以方志有缺，國史便要受病了。

早在民國十年，梁啟超在天津南開大學講述中國歷史研究法，在說史料一章中強調：別史雜記之屬，其價值與正史無異，而有時還過之。例如陳壽《三國志》諸葛亮傳記亮南征南蠻之事僅有二十字，然在常璩的《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中則用七百餘字敘述其經過。這足以說明地志的史料價值並不次於正史。三十三年前，張國淦撰《中國古方志考》，將一地的人物志、先賢傳贊、物產志、風土志、古跡志、山川志等，皆予以

列入，並謂：「方志之書，至趙宋而體例始備。舉凡輿圖、疆域、山川、名盛、建置、職官、賦稅、物產、鄉里、風俗、人物、方伎、金石、藝文、災異，無不彙於一編。隋唐以前則多分別單行，各自爲書，其門類亦不過地圖、山川、風土、人物、物產而已！」同時朱士嘉編《宋元方志傳記索引》，其自序也說：「宋代方志的體例比較完備，內容比較充實，這是與當時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史學地理學的突飛猛進，有密切關聯的。在體例方面，宋志上承史、漢餘緒，下爲後代方志編纂學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如果說漢以來修史者無不奉史、漢爲圭臬，那末，宋以來修志者幾乎莫不以宋志爲楷式了。」宋代的地方志偏重人文，記載到人物的，除專立的傳記一門外，職官、科第、學校等門中亦述及之，用以占地方吏治的良否。如周應合纂《景定建康志》，人物志分十目，又有官守志、儒學志及歷代年表，所記載的都是本府的歷史。所以地方志就是地方史，爲研究歷史的學者所必須考求的。

爲了便於中外學者能廣泛利用中國各省的地方志，方志目錄的編輯與出版是最迫切的。朱士嘉最先編成《中國地方志綜錄》問世，政學商工各界人士都可查考。民國七十四年，德毅承漢學研究中心之邀，重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以鉛字排印，也受到學者的歡迎。同年，漢學研究中心舉辦「方志學國際研討會」，會後刊行論文集兩冊，開創地方志研究的新風氣。然十年來，能孜孜鑽研撰成專著者則不多見，惟我至友茂名林天蔚教授於去年撰成《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即將於今春出版，大可彌補此一缺憾。

林教授是研究唐宋史的專家，三十五年前撰成《宋代香藥貿易史稿》，後又出版《隋唐史新編》，早已享譽史學界，在香港大學執教二十多年。近十餘年來，倡導研究地方史及家族譜，策劃舉辦學術會議，主編《地方史資料研究論文集》，於一九八五年由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出版。去年十二月，在香港及廣州舉行「嶺南文化新探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林教授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這部新著《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共分三編，第一編縱論方志的原流與發展，首述方志的功用，除補史、證史外，特提出科技、地方吏事、藝文、宗教，以及中外交通、文化交流等項，並各舉數例以證明之，皆言之鑿鑿，讀之足以啓迪新知。在述及方志的發展一節中，也以宋代爲關鍵，指出南方志書大量出現，與社會進步、經濟繁榮有其密切的關係。其第三編爲廣東方志研究，爲本書的一大特點，介紹了明清人所修的六部《廣東通志》，爲其他專著所沒有的。末附徵引書目，計古籍六十九種，方志三十三種，族譜五種，近人專著七十六種，期刊論文三十二種，可謂浩博，足以占林教授功力之深厚了。

林教授在本書的自序中稱讚大陸學者對方志研究的貢獻，並臚列近二十年內出版的

專著十多種以爲佐證，當然是值得肯定的。不過這些著作是否精審？尙沒有答案。就我所參閱的黃輦著《方志論集》一書而言，就頗有問題。如其「論宋元地方志書」一文，將鄭興裔修、鄭少魏纂的《廣陵志》列入北宋時修的方志，則大錯而特錯。據陳振孫《書錄解題》卷八載：「廣陵志十二卷，教授三山鄭少魏、江都尉會稽姚一謙撰，紹熙元年，太守鄭興裔也。」乃是南宋光宗時所修者。案：少魏字良臣，福州長溪人，乾道八年(1172)進士，見之於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三十，足證其未查原始記載，可能誤用《中國古方志考》。經查該書之頁二三五，將纂者鄭少魏誤作「字明舉，成都人，元祐進士。」不知此乃鄭少薇之字貫。似乎亦未查考《書錄解題》。可見不徵引第一手史料，而直接參用他人著作，很可能產生同樣錯誤。

我與林教授交遊三十餘年，蒙其不棄，常在宋史及方志之研究上互相切磋，獲益良多。今年春節過後，他囑我爲他的新著撰一序文，愧不敢當，謹就閱讀心得綴述如上，姑稱「書後」，不知有當老友之意否？

中國民國八十四年二月

豐縣 王德毅謹識

林著『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序

我國歷史悠久，疆域廣闊，歷代行政區劃的演變，初由秦漢時代的郡、縣二級制到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州、郡、縣三級制，次由隋和唐前期的州、縣二級制到唐開元至五代時的道、州、縣三級制，再由兩宋時（包括金）的路、州、縣三級到元以後以省領道、路、府、州、縣多級制或省、府、縣三級制。演變的規律是政區越劃越多，越劃越小；最常用的是三級制，有時用實三級，有時用虛三級。因此地方志的纂修越後越多，以地區言，靠沿海且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城市，資源富且人才多，所修地方志在質和量都比較佔優勢。處於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社會發展地區則次之；以畜牧為主的西北地區又次之。

雖然清代學者章學誠認為「志乃史裁」、「志乃史體」，但是地方志與地方史是並行不悖而不能互相替代的。史以記敘過去為主，涵蓋時間為長，重在史料；志則以記敘現況為主，涵蓋時間為短，重在調查採訪。地方志每保存一些不見於其他記載如正史、政書等的原始史料，因此其不但對地方史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就是對斷代的專史研究也應列為史料來源之一。

林教授天蔚兄大著『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內容分為三編，即「方志的源流與發展」、「方志理論與方志理論家」與「廣東方志研究」。就地方志與地方史的關係言，研究地方史，必須要利用地方志的資料，至對地方志的資料之取捨與考證那是另一問題。我們不僅是研究宋史的同行，也是對方志學研究的同道。索序於我，樂而為之，特申述淺見如文。

宋 晞

民國八十四年三月三十日

於台北市陽明山華岡

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

Preface

Professor T. W. Lin is a distinguished practitioner of Chinese local history, particularly of the Lingnan Region, who is uniquely qualified to introduce the reader to local historiography. In this three part work, he systematically shares his extensive knowledge of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gazetteer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y.

Part One,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Gazetteers,"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f how local gazetteers can be used to supplement and correct standard dynastic histories an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viduals and the arts, and relig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It continues by tracing the evolution of local historical writing and geographical treatises beginning from pre-Han times through their confluence in works about historical geography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subsequent emergence of the local gazetteer genre in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maturation during the Yuan,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contributions of influential works and 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s of different schools of writers.

Part Two, "Local Gazetteer Theories and Theoreticians," review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from the Ch'ing dynasty to our day. Professor Lin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ideas and works of great scholars of the Ch'ing dynasties including Chang Hsueh-ch'eng, Ku Yuan-wu, Ku Tsu-yü, Tai Chen, and Hung Liang-chi. He then presents new approaches to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gazetteers which have arisen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giv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theoretical views of researchers and compiler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in recent years and concluding with his own ideas about compiling modern local gazetteers.

Part Three, "A Study of Kwangtung Local Gazetteers," starts with an evaluation of three Ming and three Ch'ing editions of the *Kwangtung Provincial Gazetteer*. It concludes with discourses on many topics in the local history of Kwangtung including

biographical issues, problematic events, ethnic groups in Kwangtung and Hong Kong, and an example of what can be accomplished by using a local gazetteer in tandem with a lineage genealogy.

Professor T. W. Lin provides the reader with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nts and theory of a most important genre of historical writing in China. He also skillfully demonstrates how the local gazetteers can be used to enrich and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local historical events, personalities, and populations. All students of Chinese history will profit by reading his book.

Melvin P. Thatcher

自序

1966年，筆者擔任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首先利用廣東方志資料，研究廣東少數民族（主要是僑族）的歷史與發展。因僑人本身無文字，在方志資料中可尋得漢僑的衝突，結果，將僑區開闢為郡縣，而僑族隨至遷徙（流竄），由此可窺知僑族之興衰及漢文化之南遷與擴展。七十年代，筆者在香港大學中文系講授「方志研究」，始探索方志的理論，斯時之參考書甚少，僅李泰棻、傅振倫、毛一波、黎錦熙等專書，及梁啟超、瞿宣穎及《禹貢》內若干論文而已，八十年代，大陸提倡「方志研究」，專著甚多，如：

1983：黃葦的《方志論集》，浙江人民出版社，至1993年，擴為《方志學》，復旦大學出版。

來新夏的《方志學概論》，福建人民出版社。

林衍經的《方志史話》，華東師範大學。

1984：薛虹的《中國方志學概論》，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6：倉修良的《方志學通論》，齊魯書社，1990年有增訂版。

史念海、曹爾琴的《方志當議》，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張仲熒的《當代方志學探論》，巴蜀出版社。

至於方志學論文輯成專集及論修志之專書有

1984：《中國地方志論叢》，中國地方志協會編，中華書局出版。

1986：《新編方志十二講》，歐陽發、丁釗編，黃山書店出版。

1986：《新方志編纂問答》，林如雨編，海天出版社。

《修志須知》，浙江人民出版社。

《新地方史志學簡編》，王春瑜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

《方志學常識》，唐唯目編，重慶出版社。

《修志業務參考資料七種》，黃勛拔編，廣東地方志辦出版。

1987：《中國方志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修志文件匯編》，黃勛拔編，廣東地方志辦出版。

1988：《方志學八講》，黃勛拔編，廣東地方志辦出版。

辭典方面有

1986：《中國地方志辭典》，黃韋主編，黃山書社出版。

1988：《中國方志大辭典》，浙江人民出版社。

以上不過舉其犖犖大者，專書、論文出版者如雨後春筍，蔚為風氣。相反，一九八六年筆者轉執教於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講「地方文獻研究」（以方志、族譜、金石碑刻、古文書為主），是時台灣方志研究主要是在台灣史，雖然亦有部份纂修鄉鎮志甚至縣志、省志，但對理論之研究風氣未盛。各大學間有設立「地方文獻」一科，至獨立開設方志學者，似祇有宋晞（文化大學），曾一民（東海大學），王爾敏（師範大學）等。可參考之專書除李泰棻、傅振倫、毛一波、黎錦熙等外，祇有唐祖培在五十年代出版之《新方志學》（原在華國出版社出版，坊間已難尋到）；張其昀、杜學知等書，亦僅部份有理論而已。至於大陸之書籍，在戒嚴令下根本無法輸入，筆者憑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幫忙，將大部大陸的方志學書籍，以「研究」理由，申請攜入，聲明「限閱」，不准外借，在課程上既有大量資料，遂將課程分為「方志學」與「族譜學」兩門。同時，深感大陸專家雖多創見，但亦「主見甚深」，且自章學誠創立「方志學」理論至今已逾二百年，時代不同，社會變遷更大，需要更正與增補，以適應社會與潮流，是為撰此書之動機。

本書共分三編

第一編：「方志源流與發展」首敘方志的功用，雖不出前賢之理論，然舉例多以廣東方志資料或補以大陸最新的資料，鮮有雷同。至於「源流與發展」，筆者強調「方志二源」：即史地兩源。昔賢將方志分為「史地」獨立二原，其實兩者不同，筆者提出「史源」始於《周禮》、「地源」始於《禹貢》，在發展過程中，史之源有（一）《越絕書》、《吳越春秋》、《華陽國志》，（二）「耆舊傳」、「人物傳」。在地之源則有（一）圖經、山海經、水經注，（二）「地志」（記）、「風俗志」、「地理志」等，大概由兩漢至魏晉南北朝，仍是史、地分途發展，至《隋書》立地理目，加上隋唐初著重邊疆地理、資料增多，唐初「官修地理書」開始，於是發展成「歷史地理」的新型式，其中《括地志》、《元和郡縣圖志》，更是「一統志」的最早型式，為昔賢所未提及，僅就正於海內外諸君子。

方志之源流是（一）史地兩源—漢，（二）史地分途（越絕華陽）—魏晉南北朝，（三）歷史地理（史地合一）—隋唐，（四）創新的體裁而成方志—宋。至清代始有方志的理論，大陸學者提出方志三派：體例派、地理考證派、史法派；筆者認為祇有二

派：史法與地理考證；至於體例派不外條列綱目，兩派均酌有採取。而在時間上言，地理考證派起源較早，始於江蘇兩顧（炎武、亭林），戴震繼之，至洪亮吉始發揚光大，至於史法派始於章學誠，但能真正傳其學者似不多見，筆者管窺之見，未知能取信於海內外諸賢者？

第二編：方志學的理論與方志理論家

此編主要是敘史法派之章學誠與地理考證派之戴震及其他學者；章學誠之方志理論，文史學者言之者甚衆，各有不同的觀點，筆者按「史法」歸納為六點：（一）述志之例（方志十議），（二）撰志之要（二便三長五難八忌），（三）論志之體（三書四體），（四）論文與史之關係（六經皆史，文人不可修志），（五）論史與志的不同（國史與方志，地方史與地方志的異同），（六）其他（立志科、志官傳、及史德與史識之別），理論雖與前賢有若干類似，但筆者自有申述且自成一系統，絕非抄襲。

方志理論自章學誠提出，至今已逾二百年，梁啟超提出「方志學」一詞，至今亦幾達百年、潮流在變、社會在變，於是有「新方志學」的提出，所謂「新方志學」，應有「內容」、「機構」、「方法」三方面的不同，筆者列舉海峽兩岸學者的不同意見，最後嘗試提出「新方志擬目芻議」，企圖溶合傳統與現代而適應潮流的構思，以求就正於海內外諸君子。

第三編：廣東方志研究

內分二章：（一）《廣東通志》評介，列舉自明以來成書之六套《廣東通志》（其中如戴璟、郭棐、金光祖、郝玉麟諸書，坊間流傳不廣）分別評介，（二）廣東地方史專題研究，按：方志學研究的目標有三：（甲）理論之探討，（乙）志書之修纂，（丙）地方史事之研究；如黎錦熙之《方志今議》，除理論外兼以修陝西城固縣志為目的。張其昀的《方志學舉隅》，便純粹是新編的貴州「遵義縣志」。杜學知的《方志學管窺》內附《秦州僑置考》、《天水疆域沿革考》，便是地方史事之研究。筆者粵人，遂以志書中的資料，作「地方史研究專題」，內分「人物」、「史事」、「民族」、「方志學與族譜聯合研究之例」共十二篇，雖多是舊作，然理論與實用合而一起，亦可彰方志的功用之一。

本書原附：（一）海內外所藏廣東方志目錄，比之朱士嘉的《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及李默之《廣東方志要錄》，體例不同而書目更多。（二）清代方志學者目錄，以彰清代修志之盛；然國立編譯館認為不合「大學用書」的規例，均被省去。

本書之撰寫時，適在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講方志學，多位同學均加以寶貴的意見，而其中廖德修、陳鴻圖、陳祥雲及大學部同學劉信華、張泰明等幫忙整理，陳祥雲

同學更全部負責校對，僅此致謝。而宋晞教授、王爾敏教授、王德毅教授，沙其敏先生等，除供寶貴意見外，並賜序言，亦感謝不已。

高涼 林天蔚

歲次乙亥春撰

於台北玫瑰中國城明園寓所